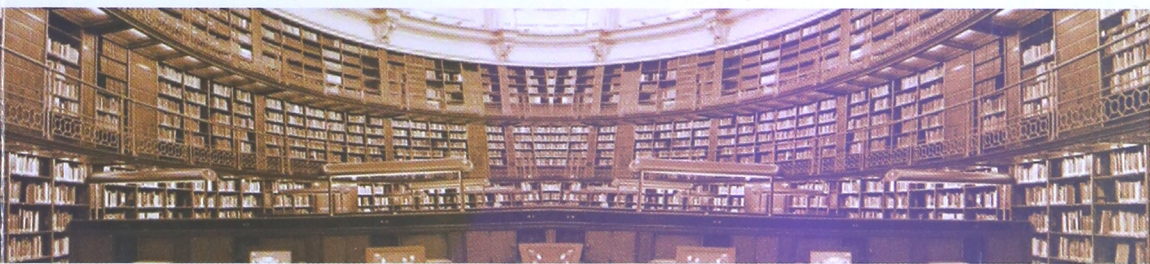


DANGDAI GAODENG JIAOYU YANJIU QIANYAN LUNCONG

当代高等教育研究前沿论丛

丛书主编◎周作宇



# 大学课程知识选择的 实践逻辑研究

DAXUE KECHENG ZHISHI XUANZE DE SHIJIAN LUOJI YANJIU

李庆丰◎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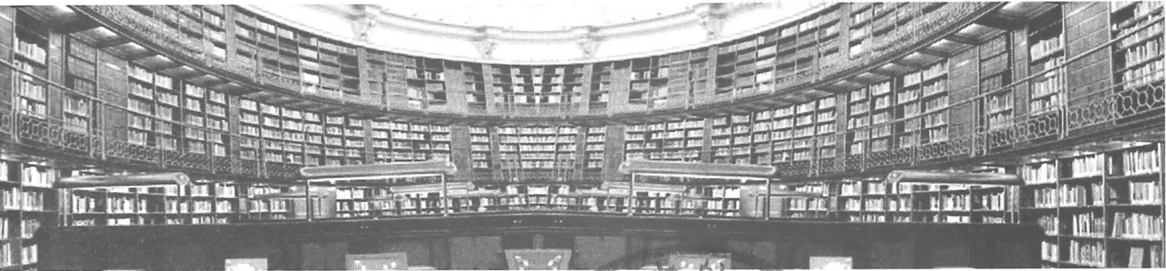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014036932

G642.3  
55

当代高等教育研究前沿论丛

丛书主编◎周作宇



# 大学课程知识选择的 实践逻辑研究

DAXUE KECHENG ZHISHI XUANZE DE SHIJIAN LUOJI YANJIU

李庆丰◎著



北航

C1725015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G642.3  
55

0140388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课程知识选择的实践逻辑研究 / 李庆丰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3  
(当代高等教育研究前沿论丛)  
ISBN 978-7-303-15862-1

I. ①大… II. ①李… III. ①高等学校—课程设置—  
研究—中国 IV. ①G64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3378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信箱 [gaojiao@bnupg.com](mailto:gaojiao@bnupg.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http://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70 mm × 230 mm

印张: 24.5

字数: 350 千字

版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72.00 元

策划编辑: 何琳

责任编辑: 何琳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国美嘉誉

责任校对: 李茵

责任印制: 陈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 总序

## 谁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的永恒话题。在高等教育规模小、受众人少、在经济社会的整体结构中的地位比较有限、对市民社会影响不大的情况下，质量问题似乎不太突出。因为能够接受教育的毕竟是少数，而这少部分人又是经过大浪淘沙、千挑万选出来的，高等教育的精英性质掩盖了质量问题。当知识经济兴起，高等教育大众化到来，传统上高等教育所承载的集政治、文化、科技于一体的精英属性被稀释，世俗生存和生活的经济性及工具性价值现形，甚至被放大，尤其是在民办教育加盟下，高等教育迅猛扩张，当高等教育就读机会像“菜篮子”“自来水”和“天然气”一般不可或缺且容易购得，乃至成为民生的重要构成的时候，人民的满意不满意就与基础阶段有所不同。面对毕业后收益对投入的简单运算，满意的内容更加丰富了。如果说基础阶段民间对教育的评价还是一种近视的、直接的、简单的、可测量的学业成绩和升入下一级教育的资质，那么，在高等教育阶段，老百姓开始从对过程的关注中解放出来，质量问题交由抽象的公众，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去议论，个人对教育的注意力暂时休息或者关闭，直到毕业的新重要关头开关才再度打开。就业是大学生个人的事，但是在毕业的时候家长们义不容辞地披挂上阵，发动新一轮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运作。在升学率获得“指标化”地位的情势下，高等教育机构也在自我觉悟后或外力驱动下，

将广开“产品销路”、提高就业率纳入责任范围。当往年的大学毕业生尚未完全就业，新一批已经加入了竞争行列，就业率就像是股市一样低迷，选择什么样的高等教育自然成为家长们新的席上和茶余的谈资。与此同时，国际高等教育在金融危机的重创下，一些昔日执守“象牙塔”精神、展现“仙风道骨”魅力、不肯沾染世俗尘埃的世界名校，现在也不得不回到人间，为了生存，将国际留学生作为“现钞母牛”，其注意力投向国外的富人或中产阶级。至于一些本来就没有多少国际学术资本的教育机构，更是抓住后发国家的“留学妄想症”和“看西洋镜”心理，向国外居民的腰包伸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波又一波适龄学生放弃祖国的教育系统远渡重洋求学寻梦，带走了举家多年的积蓄，留下了对国家教育自信的反讽。老百姓如何选择不是高等教育界应该回答的问题，高等教育应该回答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影响老百姓的选择”，“我们怎样才能不辜负老百姓的选择”。换句话说，高等教育要反躬自问，如何才能做到“让四方来贺”，而不是为别人“作嫁衣裳”？显而易见，这涉及自身的质量问题。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有许多观察角度。任何评价都不可能是纯粹的客观白描，而是特定角度下的特定价值观体现。高等教育体积庞大，系统复杂，不可能从实体上穷尽质量问题。现场的真实的质量状态需要走实证和田野的路线才可获悉。但是，如果没有在思想层面的“先见”扫描和梳理，就会将质量的“常识”当作知识。依靠停留在与现实同一层面的认识而指望获得质量的升级，无异于捉着自己的头发上天。“我思故我在”，作为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观察者和实践者，我们无法把握现实完满的实在，但是可以把握我们的“思想”。从“思”的层面切入质量问题，对“书斋研究”而言，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方法。高等教育质量观是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一种看法。其中，人们、高等教育、质量是三个关键词。以往的讨论对高等教育和质量这两个关键词关注较多，但是，对“人们”或有所忽略，或重视不够。事实上，从认识上讲，站在不同的层面和角度看到的问题的性质和程度是不同的。从实践或行动上看，在高等教育这个大系统中，不同的角色、职务和行为对这个系统的影响也有很大差异。所以，无论是从学理上界定高等教育质量观，还是从实践上检讨质量观，都需要将人的因素考虑在内。从而，“谁的”“什么高等教育”的“什么质量”的观念，如果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或同义语反复，就是对高等教育质量观的界定。这就需要对观念

主体的梳理和界定。

从观念主体看，“谁的”范围非常广，所有的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人都是观念主体。对公立教育而言，鉴于高等教育的公共性，确切地说，所有社会成员都是高等教育质量的观念主体。除非将高等教育看成是“私人物品”，否则这个命题就是真的。这种“泛主体主义”的认识看上去有失笼统，但是，忽视民间观念，漏掉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主体，恰恰是高等教育观念形态中的一种似非而是的“慢性病”。普罗大众具有双重身份，既是高等教育的供给者，也是高等教育的需求者。作为供给者，有义务、有责任、有权利关注高等教育的质量并且为保证质量而发挥作用；作为需求者，有权利要求获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尽管如此，人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每个人的“关注范围（圈）”和“影响范围（圈）”是不同的。关注圈反映的是注意力的广度和深度；影响圈是个体的言行对其他人或事态在思想或行动上发生作用的广度和强度。关注圈只限于个人；而影响圈则关涉个人选择的外溢效应，与其相关的事态或他人发生关系。除极少数位高权重的人外，一般而言，关注圈的半径大于影响圈的半径。二者之间的差反映了个人的能动性和主动性之间的差别。在同一个关注圈内，从静态上看，有的人影响圈大，有的人影响圈小；从动态上看，有的人影响圈越来越大，有的人影响圈越来越小。将影响圈和关注圈作为两个参照，对讨论高等教育质量观是有益的。无论是怎样的主体，都要从两个圈子的状态和动向上观察其与高等教育质量的关系。从实践的角度看，三方力量支撑高等教育的运行：政府、社会和高校。由这三者构成的循环三角关系，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同一国家同一地区的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从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上看，三者都是重要的“观念主体”。三个主体在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关注圈和影响圈上存在差别，这种差别或因系统、组织、个人角色分工使然，或因个体认识和解释的偏向使然。按照高校外部力量的控制或影响程度划分，存在“强政府弱社会、强政府强社会、弱政府强社会、弱政府弱社会”等几种不同的状态。外部力量介入高校的强弱有法定、惯例或执行裁量三方面的界定依据。是不是主体越强，影响就越大？不一定。这取决于从法定地位到执行裁量的距离。从对高等教育微观行为的影响程度上看，高校是观念主体的内核，政府是硬壳，社会是外场。高校是高等教育最基本的执行机构。如果没有高校自身的观念裁量和行动执行，

从法律或政策意义上看，外部力量再强大，其影响也渗透不到圈子的核心，或止于圈子之外，或在圈子里产生“形式化”的表浅作用。站在高等教育宏观系统的结构看，政府是观念主体的内核。在政府的视野里看到的不是一个机构，而是大大小小、类型不同、各具特色的机构；有教育系统内的，也有系统外的。政府是高校和社会之间发生关系的间接桥梁。政府是高等教育的提供者，代表国家和公民约定社会契约，通过将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进行信息加工转化为法律或政策，形成“外部压力”向高校传递。作为观念主体，政府乃是宏观层面的主体。它的影响力对法规、政策和宏观决策职能而言是直接的，对高校则是间接的。社会作为观念主体，其范围很广。相对某一所高校而言，组织外的企业、事业、非政府组织以及系统内的其他机构，都是实体性的社会机构。在公民社会不断形成的过程中，尤其是网络环境下，现实或虚拟空间自发形成的社会网络构成社会的非实体松散组织。社会是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人”。社会观念是分散的、分割的、分化的观念形态。社会对高校从正面提出要求、期待和信息反馈。因为高校在解释和转化为决策行动的过程中，构不成必须应对的信息，这种影响往往是弱影响。社会还通过媒体从负面对高校施加一定的压力。典型的情境是社会媒体将高校事件（尤其是一些学术丑闻）的信息源扩大化，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对学校产生强烈冲击。这种影响比较强烈。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现实社会或虚拟社会负载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客观存在，是重要的观念主体。

高等教育质量观是一种思想或知识存在。知识论乃是西方哲学史上历久弥新的主题。随着当代自然科学成熟，形而上学受到挑战，“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思想开始分化，科学知识成为人类知识的典范。围绕科学究竟是什么、能够做什么的问题，出现了科学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新兴领域。在科学哲学领域，涌现出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著名学者，讨论范围涉及科学进化、科学范式、科学纲领、科学方法等问题。以波普尔的科学知识进化论和库恩的科学知识革命论，形成相对竞争的理论。客观知识、猜想、范式、科学共同体等概念的出现，丰富了人们对科学本质的认识。波普尔将世界三分化，世界 I、世界 II 和世界 III。世界 I 是客观世界；世界 II 是人们的主观世界；世界 III 是客观知识（近似于“形式知识”）的世界。作为世界 III 的客观知识是人们长期积累起来的关于世界的认识成

果，通过书面语言和其他形式的符号外化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客观知识是人类的创造产物，由于其“物化”，具有和主体相对分离的特性。人的主观世界是一个内外信息交互作用的由“知、情、意”等元素构成的复杂世界。世界II以人为载体，是知识产生的“黑箱”。它本身是否为知识的有机构成？波兰尼提出“缄默知识”（有人译作“暗默知识”）概念，打开了黑箱的盖子，使知识的另外一个形态曝光。缄默知识也是一种知识形态，但是没有进入波普尔的世界III的范围。它体现在人们的日常行为和活动中。通过行为你可以观察和识别，但是你无法通过严格的语言进行描述和阐释。虽然只可意会，但是它确实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缄默知识将古今中外长期争论不休的“知行矛盾”调和起来。缄默知识是知和行之间的一块儿“知识飞地”，它不是人类主观世界中杂乱信息的汇总，而是对合目的的实践活动“管用”或“有效”的“窍门”。缄默知识保持“沉默”，但是它作为特殊的知识影响行动。科学哲学借哲学的方法归纳出知识的不同形态，发掘出“范式”“缄默知识”等有用的概念。与此同时，文化人类学、管理学、心理学也从各自不同的学科视角，通过不同路径揭示了人类超越“客观知识”的复杂的知识构成。诸如戈尔德茨（C. Geertz）的“本土知识”、薛恩（D. Schön）的“反思性实践者”、布鲁纳（J. Bruner）的“民间心理学”、阿基里斯（C. Argyris）的“声称的知识”和“使用中的知识”，这些指向实践知识的来自不同学科的概念，揭示了一个共同的事实，人是全身心学习和思考的认识者，除了大脑这个心理活动的“机器”，人还“通过身体思考”。人的认识成果附着在自己的神经系统“缄默存在”，也可能通过语言外化成为“客观存在”。鉴于知识形态的多样性，考察高等教育的质量观，需要既研究缄默的质量观，也分析客观的质量观。

从观念主体的认识动机、认识方法、认识成果、认识影响几个方面看，还存在着官方知识、组织（机构）知识、学术知识和民间知识之间的差别。官方知识的认识动机是解决国家或者区域普遍性问题。认识方法有调研、座谈、会议讨论、“封闭制定”等手段。认识成果是以国家和政府文件（包括法律文件和政策文件）或官方身份发表的领导讲话。认识影响是相关范围内“舆论环境”“制度环境”“资源环境”的建立、变化或革新。官方知识的话语体系和修辞手法具有鲜明的特点。“讲形势、定原则、立规矩、提要求、下



指示”是基本的语言特征。组织知识属于“知识管理”的话语范畴。知识管理是管理学发展的一个新趋势。企业界将知识管理界定为“将个人的知识和企业知识资产有组织地集结、共享，并借此提高效率，生产价值，以及以此为目的而开展的框架构建和技术应用。”<sup>①</sup>知识管理不仅仅适应于企业界。任何组织都存在知识管理的问题。一般地看，知识管理涉及组织内对洞见、经验的确认、创造、表现、扩散和促进应用的过程，是从挖掘到应用知识过程的一系列战略规划和实践活动。知识管理包括建立知识库、建立尊重知识、创新知识、分享知识、应用知识的内部环境，将知识作为资产加以管理，其目的是实现组织目的，提高组织绩效。组织知识就是在知识管理框架内一个组织所拥有的知识容量。这里的知识不是泛指的知识，而是可以用来提高组织绩效和“生产力”的知识。组织知识的载体为个人或机构，按照竹内弘高和野中郁次郎的模型，组织通过“共同化、表出化、联结化和内在化”<sup>②</sup>实现暗默知识和形式知识的转化来创造和利用知识。在这个过程中，观念主体的认识动机、方法、成果和影响结合在一起，融为一体。学术知识是从学术的立场出发，通过严格的科学或其他学术性方法对对象进行研究，发现新的事实，或对既有事实进行新的解释或分析，最后得出相对客观的认识成果，发表后首先对学术界产生可能的影响，并通过向实践的转化而获得实践影响。民间知识是和人们日常的个人或集体行为一体化的认识，通过习俗传承、传统仪式接触、社会学习等方式习得，表现为个人旨趣、集体规范、民约、禁忌或其他的行为指令。民间知识存在于民间，是最广泛的一种知识存在形式，它本身在不断变化，同时也可能向官方知识、组织知识和学术知识转化。在讨论高等教育质量观的过程中，需要从官方、民间、组织和学术几个方面考察人们的观念。这需要持续的耐力和漫长而艰苦的工作。

作为“学术知识”的探索者和创造者，在高等教育质量观进而一般的高

- ① 野中郁次郎，绀野登：知识经营的魅力 [M]。赵群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3。
- ② 共同化 (socialization)，从个体到个体，从暗默知识到暗默知识，通过直接体验分享和创造暗默知识。表出化 (externalization)，从个体到团组，从暗默知识到形式知识，通过对话和反思将暗默知识表述出来。联结化 (combination)，从团组到组织，从形式知识到形式知识，对形式知识及信息进行系统化并且加以利用。内在化 (internationalization)，从组织到个体，从形式知识到暗默知识，在实践中学习和获得新的暗默知识。参见：竹内弘高，野中郁次郎。知识创造的螺旋 [M]。李萌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8-10。

等教育问题上，高等教育研究者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学术研究应该将一切关于高等教育的知识形态纳入视野，通过多重方法进行挖掘提炼，将个人的思考和缄默知识“表出化”，提供“形式知识”或“实践知识”供学术共同体和实践分享批评。为此我们选了一系列高等教育领域的学术成果陆续结集出版。第一期包括《大学理性研究》（张学文）、《变革时代大学的核心价值》（马凤岐）、《大学特色发展的比较研究》（单春艳）、《高等院校组织趋同机制研究》（王占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中的政府角色研究》（杜瑞军）、《大学课程知识选择的实践逻辑研究》（李庆丰）、《基于学生增值发展的教学质量评价与保障研究》（章建石）和《中国高等教育评估管理机制研究》（张红伟）。学术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系统，知识的创造如波普尔所言是一个猜想和反驳循环进化的过程。我们希望这个系列能够为学术同行和实践领域的读者提供一个靶子，使它能够引起注意并且经受一波一波的批判和考验，既不被历史遗忘，又能成为别人前行的一块垫脚石，哪怕，质材还须进一步锻砺。

周作宇

2012年11月26日于新疆师范大学

# 代序

## 大学教学中不能承受之轻

大学教学及其课程中的知识选择，借用世界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名谓，也是一个高等教育改革或者大学改革中的“不能承受之轻”。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由于大学教学本身的特点以及大学教学中各种利益相关者本身的个性特征，大学中课程知识的选择也常常是充满了变数和偶然性，具有非常复杂的个体因素和主观取向。然而，这样一种课程知识的选择又直接或者间接地承受着培养高水平专业人才、国家与民族栋梁，特别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使命与责任，它关乎整个大学的办学水平，构成了整个高等教育和大学改革与发展的基础。李庆丰先生的专著《大学课程知识选择的实践逻辑研究》，正是一种对这种大学教学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研究。他根据自身的实践经验，通过对大学教学改革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与矛盾，特别是不同类型课程知识选择活动过程中的冲突及其结果的多个影响因素的分析，提出了课程知识选择中知识选择主体、知识选择价值取向以及知识选择策略模式三个核心要素，并且借鉴社会学领域的场域理论和经济学领域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有关概念及分析框架，以影响知识选择的三个基本要素为主线，对大学课程知识选择活动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展开理论上的探讨和历史演变的分析，并且建立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然而，同样重要的是，李庆丰先生将研究定位于

知识选择的“实践逻辑”，不啻给每一位大学教师和管理者提供了一次反思自身教学工作的机会和路径：我们自己是怎样安排课程的？在浩如烟海的教学资源中，我们自己是如何选择知识的呢？

记得大约是1992年年初，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给外文系本科二年级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如何能够让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掌握比较抽象的哲学理论，是一个教学的困难；特别是如何能够让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对哲学有兴趣，并且愿意学好哲学课，对我也是一个挑战。于是，我在寻求和选择比较能够切合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资源来阐述抽象的哲学原理时，真可谓是花了一番工夫。其中，我个人觉得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一节的教学。从哲学理论上讲，必然性与偶然性是事物之间存在的两种不同的联系，必然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和支配的作用，决定事物发展的方向；而偶然性的作用只是加速或者延缓事物的发展。但是，两者又是相互联系，对立统一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同时包含了两者。更重要的是，必然性往往是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并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而偶然性又是必然性的补充与表现形式，没有脱离必然性的偶然性。显然，这样的表述从逻辑上讲是合理的，但近乎绕口令式的表达，也的确让年轻学生感到不好理解。事实上，由于我们在哲学教学上没有充分注意到理论的抽象性与年轻学生的阅历尚浅的矛盾，以至于有不少人把辩证法看成是“变戏法”。怎样才能够让学生真正认识和理解这种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呢？能不能找到一个能够与这些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已经有的某种经验具有相关性，而又能够说明这种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的材料呢？在备课的过程中，我想起了多年前曾经偶然读过的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内容，特别是这部小说那富有哲理的题目。这部作品描述了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时期，国内民主改革的气息演变成专横压榨之风潮，普通知识分子命运多舛的复杂故事。特别让人深思和感悟的是，昆德拉通过一系列人物的命运的描述，包括托马斯与特丽莎的偶然邂逅，以及萨宾娜弗兰茨等人非常个性化的故事，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哲理：尽管每个人对于自己的生活都有进行选择的权利，但是，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选择及其后果，都同样应该负起诚恳执着的义务。虽然每个人的选择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在承担人生责任方面却具有必然性。这种人生

的责任，也是人生的负担，却也是最真切实在的。解脱了负担，人生将失去意义。我觉得这个小说的故事情节能够很好地说明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而且，由此提高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学习哲学的兴趣也十分合适。实践证明，我的这种认识和选择是正确的，并且达到了预期的结果。

我不敢妄谈自己的明智，只能说我非常偶然且幸运地读过了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部小说，也曾经为这个题目刺激、兴奋和思考；又偶然地与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的学生有缘相遇，这也算是职业与人生历程中的一次“之轻”吧！但正如李庆丰先生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这种“偶然性”的背后仍然存在着客观的必然性，从知识选择主体的角度看，反思这一个案背后关于大学课程中知识选择的道理，至少有这么几点体会可以与大家分享。

首先，大学课程与教学中的知识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对课程和学生的责任感，即教师的价值取向。这种责任感本身就是一种必然性，是所有大学课程中知识选择的基础。实际上，大学教学和课程中知识的选择，尽管充满了偶然性与个性，但这种选择首先是一种态度，一种对教学和学生的责任感。虽然大学教学比中小学教学具有更多的学术性，要求有更加丰富的专业理论与知识，但我认为，大学教师在备课中对知识的选择，以及由此所体现出来的教学水平，同样还是取决于教师本身的职业道德，包括他对教学、对学生，以及对自己学校的一种态度和责任感。实事求是地说，在今天的知识社会中，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特别是通过互联网等，一个大学教师能够非常容易地获取各种丰富的知识和教学资源，这些知识甚至可以认为是“唾手可得”。过去曾经非常令人钦佩的那种“旁征博引、信手拈来”等现象，也随着互联网的出现，飞入了寻常百姓家。我甚至愿意进一步肯定地说，针对不同的课程和教学，选择一定的知识和教学资源来支撑和展开不同科目的教学，也并非难事。问题是：在知识太多，以至于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根据不同课程和学生的需要与特点，选择那些最能够符合一定课程特点，并且能够适应特定学生需要的知识与教学资源，则是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恕我直言，我这里所说的“困难”，并不是教师水平的限制、资源本身的不足，也并非技术条件的限制，或者其他外在的原因，它更多的是一种主观的逃避，或者是“不作为”，是一种价值取向上的选择。在市

场经济环境各种五光十色的诱惑面前，大学教师还能不能真正地像古代经典《大学》中所说的那样，达到一种“静”与“安”的境界，进而真正有所“得”，这对于所有大学教师都是一种非常严峻的挑战。现在有些大学教师实在是太忙了！他们忙于各种学校外面的学术报告与讲课，经常出没于不同的科研评审与专家论坛，活跃于林林总总或形形色色的社会活动，等等。实事求是地说，他们也的确为国家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他们对学校和学生的责任与义务却不能不打了一定的“折扣”。显然，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其他方面耗费了太多的精力，在教学方面的精力必然会受到影响，又怎么能够耐心细致地去认真备课和对适当与必要的教学资料进行精心的选择呢？应该强调的是，无论如何，教学必须是大学教师的第一学术责任，这也是大学教师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是他们在教学活动中进行知识选择的道德基础与必要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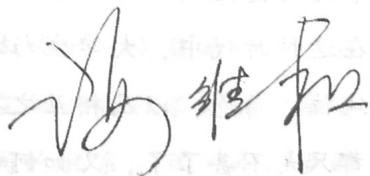
其次，大学课程中的知识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眼界与视野，这种眼界与视野决定了教师对不同知识进行评价与取舍的背景与高度。所谓眼界和视野，并不是一种抽象的素质，或者模糊的感觉，它是反映或者体现大学教师专业水平与思想境界的一种非常具体的指标，而且直接关系到大学教师教学与研究工作的质量，特别是课程与教学中知识选择的质量。我甚至愿意说，课程与教学中知识选择的质量，直接取决于教师的眼界与视野。因为，恢宏或者广阔的眼界与视野，无疑能够为课程或教学中知识的选择提供更多的素材、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比较以及更多的可能性。它体现了一种课程和教学的开放性与现代性。而课程与教学中知识选择的封闭性恰恰表现了一种课程的封建性。借用某位专家的话，所谓封建社会，正是封闭起来搞建设。这种大学课程与教学中知识选择的眼界与视野，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学科专业领域中的眼界与视野，理解本学科专业的基本问题与主要矛盾，了解学科专业的发展与历史，熟悉本学科专业不同领域和方向的新探索与变化；第二是整个知识界，特别是相关学科专业的基本情况与发展趋势，包括它们的新的研究课题、新的进展与新的成果，以及在知识和科学领域中出现的新的知识，特别是这些新的知识与本学科专业之间的联系；第三是社会经验的学习与积累，包括对于社会文化生活的认识，对各种社会问题和现象的了解，以及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变化与诉求的认识，等等。实际上，对于大学

课程和教学而言，这些社会经验、问题与思潮，同样是非常有价值的课程和教学资源，对于丰富和拓展课程与教学都是十分有益的。

最后，大学课程中的知识选择在根本上反映和体现了教师自身教育理论的素养与水平，以及教育教学专业的实践能力，这也是教师知识选择过程中的基本策略之一，它们制约了教师在知识选择中关于课程资源与教学对象，以及教学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按照美国卡内基学会原主席博伊尔的观点，大学教学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术活动，是一种非常专业的知识发展与创新的活动。而在这种大学教学活动中，知识选择是非常关键的因素。根据我的认识和体会，这种知识选择所包含的策略模式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对学生的认识。恩格斯曾经非常深刻地指出，科学的根据在于物质运动的形式及其固有的秩序。一门学科的科学性并不完全在于它自身的逻辑，而更多地在于对研究对象的认识程度。因此，对学生的认识已经成为了整个教育学科的根据。而大学课程和教学中适应的知识选择，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对学生的认识和了解，特别是学生的学习兴趣、需求及其发展层次与阶段。缺乏对学生的认识和研究，任何的知识选择都是没有意义的。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今天关于大学生的认识实在是非常的有限，充其量也只是部分关于学生学习成绩的理解，或者是学生部门及其相关机构所提供的信息，至于大学生学习规律的研究，大学生的教育地位的探讨，大学生专业发展的阶段性与规律的分析，包括大学生社会发展与心理发展的认识等，都仍然处在一种比较表面的层次，而缺乏比较深入和系统的理论把握。尤其是现代社会中的大学生，作为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他们的思想方式，知识水平与价值观念，以及他们的人生观和文化意识等，都与他们的父辈具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凭借互联网的“抬举”，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独立和系统的生活方式，包括他们的沟通方式与表达方式。传统社会中代际的交集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父辈与子女之间的交往方式与内涵，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当然，在这种时代中，大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包括他们各自的地位、角色，以及相互之间的期望，等等。可想而知，如果我们对所有这些都只是不甚了了，又如何谈得上在课程和教学中形成对学生有效的知识选择呢？可以有把握地说，一个教师对自己学生的理解与认识的深度与水平，直接制约着课程与教学中的知识选择的质量，这是一种铁的必然性。

当然，我自己的这些粗浅体会与认识，只是对李庆丰先生关于大学课程与教学中知识选择的理论研究的一点经验性说明，也是从个体的角度证明了李庆丰先生关于主体、价值取向以及策略模式的观点是科学的。但我更想进一步阐述的是，李庆丰先生的研究本身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大学课程与教学中知识选择本身的范围，构成了关于大学教学的专业性与科学性的一个非常具体的论证。客观地说，关于大学教学的专业性与科学性，长期以来并没有真正得到大学教师的认同，许多大学教师认为大学教学关键是教师的学科专业水平，而且，不同的教师完全可以有不同的教学方法与模式，因而更多的是一种艺术，是一种学科水平的体现。大学教学本身并不存在所谓的专业性。更有甚者，在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中，大学教学的专业性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即使是教师法这样的专门性法律，也只是针对中小学教师，并没有对大学教师的任职做出具体要求和规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我不敢说，大学教学的质量完全取决于大学教师教学的专业性水平，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大学教师教学的专业性水平已经越来越关系到大学教学的质量。如果说，过去许多大学新入职的教师在正式上课之前，必须跟随老教师当助教，听课、辅导和改作业等，由此熟悉大学教学的要求，获得教学经验；那么，现在大学新入职的教师具有了越来越高的学历，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科研，担任教学工作之前的准备也越来越少，这种状况能否保证大学教学的质量，不能不有点令人担忧。我相信，学术水平高，一定有助于提高教学水平，但它毕竟不等于教学水平。因为，大学教学是有规律的，是一门科学。所以，我也愿意借李庆丰先生的这本书，呼吁我们的大学管理者和教师，更加重视大学教学的专业性建设，促进大学教师的教学专业化发展，由此不断提高大学人才培养的质量。

这也是我选择“大学教学中不能承受之轻”作为书序的题目的初衷。



2013年

于日本东京北松户



# 前言

在课程问题和课程研究中，知识选择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难题，因而少有研究者问津，更少有人充分涉足该领域，从而使其成为当前高等教育和大学课程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已有相关研究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①多附带研究而少专门研究；②多单因素研究而少综合研究；③多宏观结果研究而少微观过程研究。

通过对大学课程知识选择活动过程及其结果的多个影响因素的分析，笔者发现，知识选择主体、知识选择价值取向以及知识选择策略模式是其中的三个核心要素。本书借鉴社会学领域的场域理论和经济学领域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相关概念及分析框架，以影响知识选择的三个基本要素为主线，对大学课程知识选择活动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展开理论上的探讨和历史演变的分析，为当前处于知识和信息社会前沿的我国大学深化课程与教学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供理论和历史的依据及改革建议。

理论研究表明，现代大学课程知识选择活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社会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关注和参与的社会实践场域。大学课程知识选择活动主要在国家层次的大学课程政策、大学层次的课程设计以及教学层次的教学设计和课堂教学活动四个层面展开。不同层次的利益相关者凭借其所拥有的资本数量和质量，在不同层次的场域中占据不同位置，获取不同的参与知识选择活动的权力，由此而展开以各自所持资本或所拥有的权力为基础的知识价值观及其背后的利益博弈。正是通过贯穿于大学课程全过程知识选择活动各层次之间的利益和权力博弈，从而将隐匿于知识背后的价值显现化、过程化、教育化和经验化，使外在于受教育者的客观知识逐渐演化成为个体知识结构的一部分，并与个体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融为一体，从而完成知识价值增值、减值